



最近兩年度的中國財政

佳駒

——民國十九、二十兩年度財政報告書的批評——

最近南京政府財政部長宋子文氏向三中全會提出了十九、二十兩年度的財政報告，關於這兩年內政府收支的概況，關稅，鹽稅，統稅，菸酒稅，印花稅的收入情形，以及內外債的發行與撥付，中央銀行資產與負債的狀況都有一個扼要的敘述。這個報告書雖不能與西歐各國的決算書相提並論，然而在有財無政的中國，牠卻具備與決算同一性質的意義。我們不惟可在這個報告書中觀察中國目前財政的病態，而且可以藉牠來批評國民政府財政政策的當否，看牠是否如報告書所說，政府的財政基礎，已日臻于穩固之途呢？

固然，批評中國的財政狀態，我們是不能拿西歐健全的資本主義國家的眼光來看的，這最重要的原因還不是由於當局的財政措施，而是因為客觀的社會經濟條件。如帝國主義者在華的外債與賠款是中國財政最大的負擔；如連年的軍閥混戰使得軍費支出浩繁是中國財政的致命傷。又如國家的重要稅收仍為間接稅而非直接稅，而間接稅

復多為地方當局所截留，中央所能直接支配的祇有在外人管理下的關鹽兩稅。這些都非一個單純的財政問題，而是整個的國民經濟問題，我們自不能僅責望於今日之財政當局的。第二財政報告書中的數字縱令我們相信牠是完全確實，亦絕不能拿牠來代表中國今日之真正財政狀態。報告書中所表現的祇是中央有賬可稽的直接收入或支出，但因我國目前的軍閥割據局面仍未打破，直隸於中央而完全由中央支配的省區還不到六七省，其餘各省的財政都為中央所『鞭長莫及』。再由於稅制的混亂與徵稅手續的繁重，人民的負擔愈重，而國家的收入反愈減少，地方徵收的附加稅往往反較正稅超過二三十倍。（註一）徵稅官吏的貪污剝削，更為『必然』而非『或然』的事實。僅由財政報告書中來觀察國家收支的真實狀態與國民的負擔，無疑地會得到錯誤的結論的。例如軍費之支出在財政報告書中民十九年度雖僅列有三萬萬一千一百餘萬元，民二十年度為三萬萬零三百餘萬元，但若

897¹²將各省區的軍費支出合計起來，恐至少亦當在十萬萬元以上。（註二）又如財政當局雖自謂民國二十一年起未發分文公債，（二十一年起

何以不發公債，理由後當述及。）但各省市公債之發行，卻仍是有增無已。（去年發行之省市公債據我手頭的材料已有廣東省政府發行之國防公債三千萬元，有獎庫券五百萬元，航空救國獎庫五百萬元，安徽省發行之二十一年金庫券五十萬元，築路公債五百萬元，浙江省發行之短期金庫券六百萬元，江蘇及浙江省政府合發之二十一年江浙絲業庫券二百二十萬元，湖北省政府因剿共而發行之善後公債三百萬元，山西省政府發行之金庫券二百萬元，山東省發行之省庫券三百萬元，四川二十一軍軍部發行之整理重慶金融庫券二百萬元，杭州市政府之自來水公債五十萬元，上海市政府發行之復興戰區公債六百萬元。）此種債券之最終的負擔者仍為吾僑民衆。這都是以說明財政報告書是不足以充分代表中國財政的好況或惡況的。不過，即使我們把報告書看為中央財政健全與否的指南，很明顯的有下列幾點是值得我們特別的注意：

（一）財政上收入的不合理，即間接稅占收入之大部分，如十九年度之總收入七一四、四六八、一四四·一五元中，關稅收入為三一、九八六、六五三·五〇占百分之四十三以上，鹽稅收入為一五

近五年內中國財政支出增加比較表（註）

民十六年度

十七年度

十八年度

十九年度

二十年度

〇、四八四、〇六八·七二，占百分之二十一。二十年度之總收入六八二、九九〇、八六四·一五元中，關稅收入為三六九、七四二、六三七·三〇元，占百分之五十四，鹽稅收入為一四四、二二二、七二六·二四元，占百分之二十一以上，其餘稅收亦多為間接稅，總計此項間接稅占總收入百分之九十以上。幾十年來，間接稅在財政上所佔的重要地位是一天天增加，這足證明租稅負擔的不公平，反為一天天地擴大，亦即說明中國國民經濟的不曾有什麼進步。因為直接稅如所得稅等的實施，是要以民族工業的發展為前提的，但中國的民族工業在帝國主義經濟與封建勢力雙重的剝削下，要有長足的進展是不可能的。所以為歐美國家重要稅收之所得稅，在中國財政收入上卻是沒有的。這個問題當然不能從單純的財政收入上來求解決的。

（二）財政支出不健全的增加。本來，因現代國家職務的增多，行政機構的發達，財政支出的增加，為世界各國一般的趨勢，非獨於中國為然。不過，我們要知道，中國財政支出之增加，卻非由於社會事業與國家機能的發達，而純因不生產的軍務費與債務費負擔的增進，這種增加於國民經濟，是有百害而無一利的。試一考察近五年來我國財政支出增加的趨勢：

薪務費	1,447,046.49元	8,050,000.00元	8,414,000.00元	15,090,800.00元	31,933,846.75元
政務費	8,401,006.33元	3元, 0分, 3厘, 3微	3元, 0分, 3厘, 3微	3元, 0分, 3厘, 3微	3元, 0分, 3厘, 3微
軍務費	3,116,460.48元	10元, 5角, 4分, 9厘	10元, 5角, 4分, 9厘	10元, 5角, 4分, 9厘	10元, 5角, 4分, 9厘
債務費	3,767,636.13元	33,138,000.00元	33,138,000.00元	33,138,000.00元	33,138,000.00元
賠款	3,767,636.13元	33,138,000.00元	33,138,000.00元	33,138,000.00元	33,138,000.00元

(註)——表內十六年度之數字係根據財政部所公布自十六年六月一日至十七年五月底止收入支出實數，原表曾刊載於五五六期之銀行週報，所列之政務費一項，乃統計國務費、外交費、司法費、教育費、財務費、工商費、農礦費、內政費、建設費、工程費支出之總和。十七、十八、十九、二十年度之數字均係根據財政部發表之報告書，所列之政務費乃指國民政府、行政院、司法部、考試院、監察院及其所屬機關之支出總和而言。

看了上列的表，除民十六年度因國民政府尚未完全統一，收入支出，俱未可作為定評外，其他各年則已完全在國民黨執政的時代。但我們觀察歷年各項支出之增加，則可以發現一極不健全的狀態，即增加最多者厥為軍費。夫以民國十六年之北伐時代，餉糈浩繁，所支出尚不過一萬萬三千餘萬元，民國十七年度，已統一告成，支出反增至二萬萬元以上，至十八年度更增至二萬萬四千五百萬元，迄十九年度竟突出三萬萬一千萬餘元，二十年度雖較十九年度為略減，然亦在三萬萬元以上，較十六年度竟增加一倍以上，較十七年度亦增加三分之一有奇。況此項軍務費之支出，乃完全用之於自相殘殺之內戰，與國防計劃或抵禦帝國主義軍事侵略之民族戰爭一無關係。以巨額有用的金錢，竟用之於內戰中的礮灰，其違背現代財政支出之所謂四大原則，即經濟的原則，社會的原則，財政的原則及政治的原則，無待贅述。原財政學中經濟的原則是說國家財政的支出，要以直接或間接幫助人民的生產，繁榮國民經濟的發達為依歸，這與我國財政支出之增加，反適足以促中國經濟於破產者，恰恰是背道而馳。除軍費之巨額增加外，支出增加得最快而最驚人的，乃為償還債務。南京政府近年來發行巨額之公債，五年內發行總額達十萬萬六百萬之巨，內債發行的數額愈多，而政府的負擔亦愈重。如民國十九年（非財政年度）政府共發行債額一萬萬七千四百萬元（十九年關稅，十九年捲煙，十九年關短，十九年善後），而是年政府償還之債券本息就達一萬萬一千七百萬元，較之發行額僅差五千六百萬元（參看中行月刊七期「十九年份之中央公債」一文）。除內債外，還有外債與賠款，這種外債與賠款的勒索，是帝國主義者對華經濟剝削最主要的一種形態，賠款固不用說是我們的純損失，即就借款而論，幾乎大部分都是政治借款，不為製造內戰，即被軍閥政客所飽入私囊，所以他們的償付亦是我國國民經濟的虧耗。我們再來看近年此項債務費增加之趨勢，十六年度方開始發行內債，負

89714

撥自輕，姑不具論。十七年度債務費支出爲一萬萬二千一百餘萬元，十八年度增爲一萬萬五千九百萬元，至民十九年竟激增至二萬萬四千一百餘萬元，民二十年因實行債券還本付息新條例（二十一年二月起實行），故支出略減，然亦達二萬萬三千八百萬元之巨，與民十七年較幾增加一倍，與民十八年較亦增加三分之一。此種財政支出畸形的增加，適足以反映中國財政病態的發展。

除軍務費與債務費外，還有黨務費。黨費乃爲國民政府時代所特有，黨費應否由人民負擔，是政治問題，我們暫且不去管他。惟查黨費一項，民十六年支出尙不過一百六十餘萬元（這自然是因爲國民黨尙未統一中國，許多省份還沒有黨部的設立），但到了十七年度便增至四百餘萬元，民十八年增至四百六十餘萬元，民十九年且超過五百萬元，二十年度支出略減，然亦達四百萬元左右。按近年來教育與實業費的支出實數，因報告書中無專項敘述，不能確知，但查民國十六年財政部發表之實收實支數來看，是年的教育費支出亦不過二百五十三萬元，實業費則僅十萬二千零九十九元（合工商費與農礦費），可知十六年教育費之支出僅超過是年黨務費三分之一，而實業費則尙不及黨費支出十六分之一。即拿民國二十年度的預算來說，教育文化費的

總數不過一千六百餘萬元，實業費則僅五百三十三萬元，同年黨務費支出之預算亦達六百二十四萬元之多，亦遠超過實業費之數。雖然實際上二十年度黨費之支出據報告書所載不過三，九二二，八九四元，但教育實業費支出之不及預算案，亦是可斷言的。在這裏，我們不是要討論這筆黨費應否由國庫支出，而祇是說，假若中央及各省市政府能把這筆黨費支出用在文化或建設事業上，或者不無相當的成績了。

其次我們來看政務費，則可知近年來政務費非但沒有增加，而且反有減少的趨勢，如民國十七年度爲二千八百餘萬元，十八十九兩年略爲增加，即十八年度爲三千四百餘萬元，十九年度爲三千五百餘萬元，但至二十年度，則僅有二千六百四十餘萬元，不惟較十九年度減少九百萬元，且較民十七年度亦大爲減少。夫以中國幅員之廣，政務之繁，應與應革之事，何止萬千，政務費自應隨年俱增，乃事實上反成逆態的減少，豈非異態？而且我們還要知道這二三千萬元的政務費中，幾完全爲行政費用所占，至事業費則根本不見他的蹤跡，似此又何怪乎年來教育實業一無建樹，反成崩潰的現象呢？

（三）財政報告書第三點值得注意的就是財政支出的不合理，即軍務費與債務費占支出總額百分之八十以上，下錄報告書中之一表：

支出總數		軍費		債務與賠款	
總數	百分比	總數	百分比	總數	百分比
十七年度	四四〇,〇〇〇,〇〇〇元	三三〇,〇〇〇,〇〇〇元	七五·五	一一〇,〇〇〇,〇〇〇元	二四·五
十八年度	五五〇,〇〇〇,〇〇〇元	四四〇,〇〇〇,〇〇〇元	八〇·五	一一〇,〇〇〇,〇〇〇元	一九·五

十九年度	418,000,000元	111,000,000元	54,000,000元	120,000,000元	80,000,000元
二十年度	330,000,000元	(包括歷年付款合計 100,000,000元)	140,000,000元	140,000,000元	30,000,000元

觀右表，我們如將軍費與賠款債務合計起來，即知這兩項支出，民十七年占總支出額百分之八五。一，民十八年占百分之八三。六，民十九年占百分之八四。三，民二十年占百分之八三。八〇，平均每年占百分之八十四以上。似這種背乎經濟原則支出的病態，不惟是中國財政的致命傷，實在也是中國整個國民經濟的致命傷。這種不合理的支出如不改正，我敢說中國的經濟是絕對沒有出路的。

(四)報告書中第四點值得我們注意的是中央財政之借債還債的局面，關於這點，我們在前面已曾提及。近年來舉債的總額，報告書中有一表示之：

年度	支出總額	舉債總額	百分比
十七年	418,000,000元	28,000,000元	一六·四
十八年	350,000,000元	101,000,000元	一七·七
十九年	418,000,000元	111,000,000元	二六·四
二十年	330,000,000元	130,000,000元	一九·〇

(十七年度舉債總額中，創辦中央銀行所借之資本二千萬元，尚未計入)

四年內總共舉了五萬二千八百萬元的債，事實上還不是借債還債？報告書上說：『十九、二十兩會計年度之借債數目，驟視之，似甚可懼，然此數包括歸還債款本金三二〇,〇〇〇,〇〇〇元在內，以此項巨款，

皆於兩年中撥付者也。』我們看十九、二十兩年內舉債總額之三萬四千七百萬元中，還債數目就達三萬一千萬元，則政府實際由發行債券所得不過三千七百萬元。但南京政府所負的債額截至二十一年六月底（二十年會計年度之終了）止，單就牠自己所發的債券來說（即把北京政府發行，而現歸南京償還者不計在內），所負本金尚有七一六，九一五，五〇五元（據浙江興業銀行國府每月應付內債本息之統計）。政府每月為撥付內債而支出的本息，在債券變更還本付息新條例未實行以前，月須一千四百餘萬元，新條例實行後，每月須八百六十萬元，這種剜肉補瘡的辦法，財政安得不趨於破產？

南京政府於五年內發行公債票面額達十萬萬六百萬，以視北京政府之十五年內僅發行六萬萬一千八百萬元者，不啻大巫之見小巫。我們如不以財政年度來區別，則知發行債券最多的一年為民國二十年，計發行四一六，〇〇〇,〇〇〇元，十九年發行額為一七四，〇〇〇,〇〇〇元，十八年為二四三，〇〇〇,〇〇〇元，十七年為一〇三，〇〇〇,〇〇〇元，民十六年為七〇,〇〇〇,〇〇〇元。但政府在五年內發行額雖達十萬萬元以上，而實際所收則不過五六萬萬元左右。因自十六年五月起，迄二十一年一月止，南京政府發行公債及庫券，計二十五種，舉債總額達十萬萬六百萬（詳表參看本誌新年號拙

16 著國民政府與內國公債，但據財政部報告書中央收支表中「公債及庫券」收入之實數，不過如下列所示：

債券收入		發行額
民十六年	六、四三三、三二七元	六、四三三、三二七元
十七年	六、五五〇、六九元	三、一〇〇、〇〇〇元
十八年	九、五五〇、六九元	一、五〇〇、〇〇〇元
十九年	二、八八六、四八六元	二、八八六、四八六元
二十年	二、五五〇、六九元	一、五〇〇、〇〇〇元
合計	三、四三三、三二七元	一、〇〇〇、〇〇〇元

即此可知政府所實收不過發行額之五六成，因發行債券類多當中央財政窘迫之秋，除江海二五，續發二五等二三種為一種帶有強迫性之勸募外，餘均係以債票預先向銀行界抵押借款，待至債券在市場售出後，再以市價結算。所以公債的發行價格雖規定為九八或實收，但事實上債券的市價高者亦不過七八十元，低則甚至至三四十元者，政府所收僅及發行額之五六成，而清還時仍須依照票面價值（Face Value）十足償付。在政府祇求有債可借，不怕飲鴆止渴，將數十年後的稅收盡以之為抵押，至於喪失國家的元氣，增加國庫的負擔，自非所計。在銀行則因公債的利息優厚，債券既可作證券發行的準備，復可用作證券市場的投機，又何樂而不為。近幾年來因農村經濟加速的崩潰，各省區連年的混戰與兵災，鄉村中凡稍有資產者莫不移住於大都市，

造成了都市遊金膨脹，鄉村金融偏枯的畸形現象。據張公權先生的估計，全國的現貨，能稱為資金的，不過六萬萬元左右，而上海一埠所占的成分便在一半以上。資金既大量偏在於上海，而大部分又握在銀行界手中，銀行握着這麼大量的現貨，如以之投入生產事業，則因我國工商業的衰敗與凋零，民族工業外受列強先進資本主義國家大資本的排擠，內受封建勢力的重重剝削，早已奄奄一息，銀行家如將資金投入這裏面，非但低率利潤沒有保障，且有本金破產的憂慮；如以之作公債地產標金的買賣，則鉅利轉手可以立致。幾年來政府之所以能發行巨額公債，而上海銀行界之所以能承銷大批公債，其原因即在於此。上海銀行界所保有的債券額，據我的估計，合有價證券，發行準備，及抵押債券，至少當在三萬萬元以上，即占現有債券總額百分之四十。這個結果，就是一面把巨額的資金束縛於不生產的債券上，不能用之於生產事業；別方面卻使南京政府的財政基礎建築於上海的金融資本上。（或者也可以反過來說是財政勢力對於金融資本不斷的壓迫。）但中國的金融資本卻是典型的半殖民地的金融資本，牠並不由於民族資本主義發展所誘致，而是大部分為買辦資本官僚資本所轉變的。因為帝國主義經濟是中國經濟的主要形態，在華的外國銀行不但投資到礦山交通及各種輕重工業上，而且還經理一部分國庫，發行鈔票，操縱外匯，壟斷貿易，換句話說，他們是握着我國金融的命脈。中國土著的金融資本非但不能與之相競爭，而且要依賴他們而生存。中國的銀行非但

不能助長民衆工業的發達而且時時阻礙民族工業的發達（註四）當

然我在這裏並不是把中國金融資本與外國金融資本的矛盾完全看掉的，我的意思祇是說中國銀行資本與其視為與帝國主義金融勢力相對立，實不如視為牠的附庸，其妥洽性與倚賴性是遠勝過他的革命性和獨立性的。）中國的財政勢力既這樣地與金融資本相結托，而中國的金銀資本又不過是帝國主義者的附庸，這就可以說明中國政府自九一八以來對外的全部態度了。

說到政府發行債券的用途，我在內債與金融一書上（將由北平社會調查所出版）有一個詳細的分析，計用在軍政費上的占百分之八十六，用在金融事業上的占百分之九，用在賑災上的占百分之四，勉強能視為建設事業的（疏濬海河公債與江浙絲業公債）僅占百分之一，以百分之八十六的公債用之於軍政費上，其紊亂財政，壓迫金融，促使國民經濟於破產，又是不待明說了。

（五）財政報告書中對於最近的財政狀況最足自豪的一點，就是說，自二十一年起，未舉一債，認此「實為民國成立以來所創見，當此世界經濟衰落之際，各國財政幾無一不告巨額虧絀，而我國遭去秋之水災，數千萬饑民，嗷嗷待哺，政府不容不負救濟之重任，加以銀價跌落，日人攫取東北稅收，繼又進襲淞滬，種種天災人禍，相迫而來，獨能平衡預算，勉渡艱難，多難興邦，或可於此覘之也。」照此看來，似乎中國的財政狀況較之西歐各國更要樂觀，因為西歐各國，年來無不關預算不敷，尚

要舉債獨我國「不舉一債而能收支相抵」這豈非「多難興邦」的象徵嗎？

但事實並沒有如斯的簡單，不要說外國的舉債乃為彌補政府預算一時的不敷，與我國之靠借債度日者不可同日而語，而且我們還要知道去年政府之未曾舉債，並不足以證明中央財政之良好，而是有牠不得已的苦衷的。

緣自去年二月改訂債券還本付息條例後，所有債庫利息概改為長年六釐，償清年限，除十七年金融長期不變外，餘均延長還期，換言之，向來以二十個月還二十元者，今改為四十個月還二十元。持票人既受此項重大的犧牲，故有「政府不再向各商業團體舉債為內戰及政費之用」的規定（見持票人會對於內債之宣言，原文曾載入財政部新訂債券章程彙編內）後，當傳聞政府將發行勸匪公債時，據銀行界巨子林康侯表示：「減低債息及延長還本，乃以國民政府在四年內不發新公債為交換條件，倘政府一旦發行任何公債，該會（指持票人會——筆者）將起而反對。」是可知去年之未發公債，實受該項交換條件所限制，不僅此也，自債券還本付息新條例實行後，各項債券市價遂一跌而不可復振，如十八年關稅，在上海停戰協定簽訂後，最高價格亦不過為二十八元五角，最低為二十七元一角，此後始終在三十元上下浮動，鮮有超過三十元者。其他各債，亦莫不皆然。茲將各項債券，前年一月之最高價與去年十月之最高價比較觀之：

債券名

一九三一年
一月最高價
一九三二年
十月最高價

差額

整理六釐	五.〇〇	三.七五	
九六公債	三.〇〇	四.五〇	一.五〇
關稅庫券	三.七五	五.五〇	一.七五
編遣庫券	三.七五	五.〇〇	一.二五
裁兵公債	三.七五	五.〇〇	一.二五
十九年關稅	五.〇〇	四.〇〇	一.〇〇
十九年善後	五.〇〇	四.〇〇	一.〇〇
二十年捲煙(二月)	六.〇〇	四.二五	一.七五
二十年關稅(五月)	六.〇〇	四.二五	一.七五
二十年統稅(九月)	三.〇〇	四.〇〇	一.〇〇
二十年鹽稅(十月)	三.〇〇	四.〇〇	一.〇〇

(註一)上表市價，係根據銀行週報社出版之經濟統計。

(註二)二十年發行之公債，因一月尚無市價，故各取開市一月之最高價。

觀此，可知各項債券價格，二十年一月與二十一年十月相較，無不慘跌至一倍以上，一年以前值七八十元的，現在卻祇值三四十元了。這種慘跌的原因，雖半由日本帝國主義之武力侵略而為人所為的跌價，但大部分卻不能不說是因發行過多而為自然的跌價，益以去年二月實行新條例後，債庫的利息驟為減少，市價遂更一蹶不能復振。債券價格既如此慘落，發行新債，自為事實所不許，這我們舉一事實即可證明：查二十年金融公債發行於去年一月，但二十年金融最初數月並無市價，

詢之銀行界中人，則云政府不許開市價，何以故？蓋因二十年金融的八千萬元，財政部將債票盡數向銀行抵押借款，抵押之數，吾儕局外人固不得知，想當為三四千萬元。但自還本付息新條例實行後，各項債市，無不狂落這時如將二十年金融開市，票面百元，或不能售三四十元，以此計價，恐政府抵押所得之借款，非但不能找進，反要補出。果然，到以後二十年金融開市後，價即在三十元以下。由此一例，可知續發新債即無持票人會之限制條件（四年內不許發新債），亦不可能。蓋如發行一新債，若利息優厚，償清期限迅速，政府固可多享實惠，但一則格於新條例，以同為債券，辦法何能兩歧？且人民對於新債之優厚條例亦根本不會信仰，因從前的發行條例既以政府之一紙命令而變改，安知新發行者將來不然。二則去年之所以變更還債條例就是因為「稅收奇絀，基金不敷，政府雖欲暫維債信，或為事實所不許，」故不得不減輕利息，延長還本，若再發新債，基金豈不又成問題，如無確實之基金，銀行家安肯承銷？三則因過去五年濫發公債之結果，實已達社會消納力以上，社會之資金有限，債票已不能再銷。二十年金融，已可作前車之鑒。況政府若如新辦法發行低利的債券，尤為事實所不許，因從前發行公債，賴利息之優厚，擔保之確實，銀行界樂於承受，政府亦能拿到發行額之五六成或六七成，今則一開市價，便落在三十元以下（如二十年金融），即欲求對折抵押借款，銀行亦不承諾，因售之市場，且不能得此數也。執此數端，可知政府二十一年起之未發一債，實因過去五年之公債政策今日

已經破產，財政當局欲求補苴收支不敷，已不得不另闢財源，非真『多難』之足以『興邦』也。

何以證中央財政狀況之不因未發一債而日趨穩固呢？這我們祇要舉出幾個主要的事實即可說明：（一）因去年財政之屢陷絕境，財政部曾屢有鴉片實行公賣的擬議，財政當局且爲此事而一度辭職（六月初），公賣計劃雖因民衆之竭力反對而未得實現，但在中央直轄下之省區（非中央統治的省區，鴉片公賣，不消說。）似已實行，禁煙收入之爲中央及地方重要的財源，乃是一個不容否認的事實。（註四）（二）去年七月初因洋釐慘跌，財部有實行廢兩改元的計劃，當時外間以爲政府真有統一幣制的決心，多方響應，作者亦曾在獨立評論（第十期）發表一文樂觀其成，以後纔知道醉翁之意不在酒，不過欲藉此來作徵收銀行紙幣發行稅的交換條件，且聞政府擬於廢兩後實行紙幣政策，利用通貨膨脹政策來補救財政上的虧絀。（三）政府於去年交涉停付英美庚子賠款一年（自一九三二年三月起至一九三三年二月止），但英美庚款本已退還爲中國教育文化事業之用，在他們是惠而不費，在我國則等於撥教育文化費爲軍政費之用。（四）去年豐收，且成穀賤傷農，但政府反有續借美麥四十五萬噸的計劃，因爲在美國是賒賬，而中國政府把美麥折合成價，售之市場，卻可得二三千萬元的現款，這是變相的外債。上述雖是些片段的無統系的事實，然已足證明報告書上所說『財政上之顯著進步』是未容許完全樂觀的。

說到中央財政的前途，我們還可以由國民政府主計處最近所發表之二十一年度國家總概算來論斷，據此概算，則本年度財政收支之不敷，實乃無可諱言，即收入總數僅六萬萬二千萬元，而支出總數經主計局核減後，尙有七萬萬八千萬，相差達一萬六千萬之巨。若依各機關原列之數字以觀，歲出總額竟達十二萬四千餘萬元，恰爲歲入總數之二倍（軍費一項，已超過歲入總數），現雖經主計處核減，但事實上能否辦到，自是疑問。歲入方面，稅收減少最大者厥爲關稅，概算中列爲三萬五千萬，較二十年度預算減少二千四百萬元，這是由於東北各海關被僞國攫奪之故。歲出之支出最巨者仍爲軍費，約占百分之四十七以上，次之爲債務費占百分之二十五，至於教育文化費則僅占百分之二，建設費實業費司法費蒙藏費，均不到百分之一，所以概算書上也說：『衡以國家經費分配之原則，與財政的原則，經濟的原則及社會的原則，均多未能相合。』由這個總概算中更可以看出中央財政之紊亂狀態，依然還是持續着的。

總括起來說，由十九二十年度財政報告書來觀察中國目前的財政，牠的病態至少有下列幾點：（一）財政上收入的不合理，即間接稅占收入之大部分，這是表明租稅負擔之不公平，富者納稅反輕，貧者納稅反重。（二）財政上支出的不合理，不生產的軍務費及債務費占總歲出百分之八十四以上，且這兩項支出爲可驚的膨脹，政務費非但所占百分比甚微，且有減少的趨勢，至事業費則根本沒有牠的地位，反而黨

89720 務費一項，每年要支出四五百萬元之多，這種黨務費還僅指中央執行委員會及中央政治會議而言，若各省市縣黨部之由省庫撥發者尚未計入，合起來必更有可觀。(三)中央借債還債的局面，依舊沒有打破，但因五年來濫發公債的結果，卒使公債政策亦宣告破產，政府自二十一年起未發一債，並不足以證明牠財政基礎的穩固，而祇是表示今後不得不另闢財源，甚至要在不正當的收入如禁煙上去想辦法了。(四)從二十一年度總概算中，又可以看出中央收支不敷之繼續增高，報告書中所說的『預算平衡』，至少離現實性還是很遠的。

從中國財政的紊亂狀態中，我們更可以證明中國財政之致命傷是由於帝國主義在華的經濟壟斷與封建勢力的殘餘統治。且又因這兩種勢力的結合，使得中國民族工業無法發展，所以要想施行直接稅如所得稅之類為不可能。帝國主義者不但在中國推銷商品，吸取原料，

牠實實在在握着半殖民地經濟的命脈，把持中國重要的稅收關鹽兩稅，同時他又以市場有限，不得不取直接的政治投資（外債）與經濟投資形態，以解決他的過剩資本，因而取得了中國的財權與政權，結果是一面驅使中國於半殖民地化，另方面，阻礙民族資本主義的擡頭，所以，帝國主義在華的經濟統治形態是中國財政破產的一個首要因素。第二，二十年來，儘管國家財政窮得無以復加，儘管歲入歲出不敷甚巨，但一部分官僚軍閥依然可以揮霍無度，過他們窮奢極侈的生活。反而因財政的危機愈大，搜括的方法愈加週密，貪污亦愈加發達。結果就鬧得今日國民經濟總破產，賣兒鬻女之聲，隨處可以聽得見的悲慘現象。如何打破今日財政的困難，這不是單純的財政問題，同時還是一個政治的問題，如何挽救今日中國經濟總破產的危機，這不能僅責望於財政當局，我們每個國民都應該負起責來的。

(註一)如江蘇江都縣之忙銀，每兩帶徵(一)省稅一元二角八分，(二)省教育稅四角七分，(三)地方附稅三角，(四)平教料一角四分三釐五毫，(五)清鄉費三角，(六)新舊兩案款捐九角六分八釐，(七)教育育嬰費九分，(八)自治費三角，(九)普教款捐一元九角三分六釐，(十)縣道款捐二元四角二分，(十一)警察款捐一元二角，(十二)改良農業捐四角八分四釐，(十三)抵補教育不敷費四角一分一釐四毫，(十四)積穀錢三分五釐，共計銀元十元九角六分五釐。此外復蓋紅戳三道，其一徵收一元三角，一應徵二元四角二分，一應徵九角六分八釐，是忙銀一兩，實徵銀元十五元二角九釐(二角九釐為罰金)，為原額每兩合一元五角之十倍。

(註二)如四川一省之軍隊調查有五十萬，以每兵每月十元，計則全年需六千萬元左右，軍需一切，尚未計入。

(註三)如前年上海絲廠因生絲銷路停滯，將絲車存庫向銀行抵押，至不得開工。在國際貿易上占有地位之杭州絲織成織綢公司，去年春亦因資本周轉不靈，向中國銀行抵借之款無法償付，一度宣告停業。

(註四)如湖北省每月收入總數之一，一九四五〇〇〇元中，特稅協款為四六五，〇〇〇元。據湖北省歷年財政收支概況報告，十九年度總收入為一五，八六〇，〇〇〇元，特稅協款占三，六一〇，〇〇〇元，幾當四分之一。二十年度之總收入一六，七三〇，〇〇〇元中，特稅協款為五，四五〇，〇〇〇元，均當三分之一。